

本刊從四月號(總22期)起,開始介紹並參與世界性的當代藝術危機討論。國內外讀者很關注這場關乎藝術未來發展和文化建設的討論,紛紛投書、來稿。摘編部分來信,已形成熱鬧的小型討論了。

——編者

「現代性」問題， 是這場藝術討論的核心

四月號上的藝術討論已注意,由此引發的「現代性」問題,我覺得有深入探討的必要。從司徒立與金觀濤的通信來看,「現代性」問題不局限於藝術問題。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直面「現代性」,或意識到「現代性」這一概念區別於「現代」或「現代化」的特殊重要意義,似乎也是近期的事。如果說,貴刊最近幾期給人以越趨活躍的印象,或可以用越趨「國際化」來概括,我想這次藝術討論也可視為一種契機的。

「現代性」問題,據我理解是這場藝術討論的核心,其深入探討的潛力,乃在於如何看待這二、三十年來西方文化走向,和如何把握我們所處的文化轉型。在界定他者的「過程」中界定自己。而我較為關注的是「中介」和「過程」,即涉及「理論旅行」中的一些問題。

陳建華 波士頓(美國)

94.6.8

新的文化精神正在抬頭

收到94年4月號《二十一世紀》令我大為振奮,我早就覺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得一場反思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運動遲早要到來,高行健、司徒立先生從法國帶來的消息實在令人鼓舞,這使我感到一種新的文化精神正在抬頭。這種新文化精神便是理想主義的精神、理性主義精神。西方文化發展史自盧梭為平民說話以來,一直在進行着尼采所謂的「神聖的下降」。然而自本世紀60年代以來,這種下降已越來越趨向非神聖的了。80年代中國文化界的消極情緒尚未徹底顯露出來。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文化背景顯然已不同於以往,在這個背景上,這種聲音似乎已顯示出了它更為鮮明的文化針對性——對氾濫成災的痞子文化的抵制。

讀者 武漢

94.5.9

「看熱鬧」,也需要門道

《二十一世紀》做了一個很大的功德:今年四月號介紹了西方藝術界的一場大論戰的新情況,文章有三篇之多。現在西方藝術發展的矛盾終於爆發了:是創新抑或撞騙?理性常識抑或標新立異?繼承傳統抑或全盤推翻?尊重藝術價值抑或炫惑於商品魔力?……?這次已開始了一場大決戰。

我們身處大陸,看到海那邊這場熱鬧戲,卻也百感交集,同時感到興奮有趣。但是,我們這邊看得懂這場熱鬧戲的人卻也並不多。俗語說:「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現在我才發現「看熱鬧」也需要有一點「門道」。由於三百多年來各種各樣的鎖國政策,我們很多人對於西方藝術鮮有所知,許多人連拉斐爾都不知道,更不必說本世紀的馬蒂斯、畢卡索、杜象(M. Duchamp)、沃荷爾(A. Warhol)的大名了,那怎樣能看得懂海那邊這場熱鬧戲呢?

讀者 北京

94.5.27

「公共性」與「價值溝通」 的關係

讀到四月號上司徒立先生和金觀濤先生關於藝術與哲學的一組通信,內心深有震動。

我注意到通信中隱約提到的「公共性」與「價值溝通」的關係。信中提到:「藝術的本質正在於價值的溝通」,這溝通在歷史上即體現為藝術曾向那個時代的人們提供了「一個盡可能忠實的公有現實」的描繪式表達,聯繫到金觀濤先生後來說的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

本質分野：「現代社會允許文化價值選擇上的多元和自由，而前現代社會總是存在着主導性意識形態，或者說有一種普遍的價值取向成為社會文化之主體」，自然地就有一個問題會浮凸出來，即：在前現代藝術中體現的主體精神，究竟是價值溝通的產物呢，還是單一價值體系的產物？換個問法也即是說：公共性是建立在價值溝通的基礎之上呢，還是它本身就是一種價值規定？

是否可以在這樣一個放大的背景下，重新理解曾經成為現實的公共性：它標誌着一個統一的精神傳統和精神背景，而「統一性」是精神存在的必然趨歸，溝通也只能發生在這樣一個唯一的精神秩序背景中，溝通依賴於相同的價值體系；而後現代主義所造成的偽公共性即來源於對公共性的普遍誤解，它以為公共性是簡單的加法，它不瞭解公共性還有一種精神深度上的王者之氣。

周毅 上海

94.5

改換世界文化的格局

貴刊四月號關於「當代藝術危機」的一組報導，尤其是先鋒藝術的身體力行者高行健的文章，讀後啟發良多。先鋒藝術本身是文化危機的產物，它拒絕認同主流價值，用類似絕食抗議的自我異化，成為危機的抗毒劑。如今，反危機反出危機，的確令人深思。

仔細讀之，可以看出，西方先鋒藝術，尤其是其中最容易商業化的美術，落到市場懷抱中去吃奶，當然只能與股票

期貨一樣大升大跌，「服從市場規律」。有論者謂先鋒文藝對主流文化是「以金齋帶聯結的逆子」。處好這個兩難之境，本是先鋒題中應有之義。把事情做糟的，看來是西方的先鋒美術批評。這些人控制了頒獎、收藏、出書，於是哄抬價格捧托「新星」，與西方傳媒界俗文化之間的勾搭調情幾無區別。要說危機，首先是先鋒批評的危機。

由此聯想到同期司徒立先生之號召：「面對這次歐洲的藝術論戰，中國知識分子應該參與進去。」我非常同意。近十多年來，「第三世界」國家先鋒文藝勃興，正在改換世界文化的格局。先鋒文藝從社會邊緣走向地理邊緣，高行健的「東方式」先鋒戲劇，使歐洲觀眾耳目一新，即是佳例。固然「第三世界」國家先鋒批評相對更弱一些，但也正好沒像西方那樣體制化主流化（吳瑪俐小姐描述台灣先鋒藝術所受冷遇，正是健康的症狀）。或許我們的後殖民時代批評能為這場「先鋒危機」提供最佳視角，甚至回生轉機？

趙毅衡 倫敦

94.5

創作主體與接受主體是兩回事

金觀濤與司徒立的通信很有味道，讀了亦受啟發，但是在第五封信中，他想界定「主體性」，卻犯了一個概念混淆的錯誤。藝術（繪畫）的主體性是一個大題目，創作主體與接受主體是兩回事。觀濤把這兩者混為一談，籠統強調參與性。其實（繪畫）創作主體更着

重於自我的表現、體現、體驗、宣洩、物化……等等，畫即是我。主體不是畫之外的參與介入。接受主體就不同了，對他而言才有一個參與、滲透、介入、印證、觀賞、融合的問題。

丹晨 北京

94.7.3

除了上面一組參與當代藝術危機討論來信外，我們還收到讀者對本刊的建議、意見和讀後感。

作者的特殊經驗及思考

六月號《二十一世紀》中，最令我感興趣的是對韋政通的書評，不是其文章本身，而是其作者之一的朱永嘉。這位當年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才子，文革期間以一介書生從政，位及市革會常委，1976年以後又作為「四人幫餘孽」坐了十六年監牢。以這樣近乎與世隔絕的經歷，竟然能夠與當今的知識背景同步，殊為令人驚嘆！可以看得出來文章裏面滲透着作者以其特殊的經驗對歷史的鄭重思考，比如對康有為大同理想非實踐性的分析，就多少暗蘊着對毛的悲劇的闡釋。儘管就文章而言，除了有幾段較有見識之外，就整體而言是無甚高論，但出自朱永嘉之筆，實在很不簡單。

由此想到文革這一內蘊如此開放、豐富的歷史文本，其可能具有的意義，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都遠遠沒有發掘

出來。法國大革命結束不久，法國的馬迪厄、基佐、托克維爾、英國的柏克等大師就有關於這一革命的經典性著作問世。但是在我們這裏，文革幾乎被有意或無意地遺忘了。一場重大的歷史事件倘若在思想上沒有留下它的遺產，這是歷史的最大浪費！當然，文革是否陷入了浪費的命運，現在作斷言還為時過早。如果不同的人們——無論是當年的受害者還是參與者、旁觀者，或者與文革沒有經驗指涉的後文革一代人，都能超越習慣的公共話語，從個體自身的經驗和理解出發重新闡釋文革，發掘出不同的意義，那麼我們就等於拯救了歷史，拯救了一筆曾經用幾代人的理想和獻身換來的思想遺產。

林季 上海
94.7.3

應該面向實際生活

甘陽先生在〈鄒讜教授《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序〉(總18期)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很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在中國現在的政治結構和文化心理狀態下，對立的兩種政治力量，如何取得妥協、如何不被單一的政治行動方式所局限？

從這一問題引申開來，一些非常嚴峻的問題擺在整個中華民族面前，甚麼時候，我們的民族、社會才能擁有這樣的器度和客觀條件，允許兩個不同的政治團體和平共處？

許多學者認為中國文化深具平和中庸之道，但卻一次又

一次地從歷史和現實中發現，中國人的政治團體和群體是極容易走上極端，最容易互相將不同見解的人視為誓不兩立的敵人。

應該深刻省思中華民族的極端化的傳統意識和文化氣質。這種傳統意識和文化氣質已經成為一種政治現實，一個文化問題。

中國文化令人着迷又令人恐怖，它不僅衍生出誓不兩立的政治立場和態度，你死我活的政治歷史和政治現實，它還衍生出人生日常的人際關係的極端對立化的習慣。且不说群眾參與政治活動時的狂熱的違反正常法規行為的激烈化，就是在海外科技的學者和文化人士中，因與導師不和或妻子離異，竟然用槍和斧子殺死導師和妻子。殺人兇手，居然會引起相當多的正在接受現代教育的大陸人士的同情和悼念。更令人吃驚的是，這許多同情悼念者還會從中西方文化中抽出兇手們有利的應該殺人的理由，視殘暴為正義，視罪惡為美德，把獸性當成天才氣質，把胡搞蠻纏當作正當理由。在為殺導師和殺妻子的惡棍的偏袒和辯護的言辭中，一方面相當程度反映中華民族在海內外一直存在的整體性的可怖而又可憐的精神缺弊，另一方面則照射出一些留學精英們在西方世界的新的精神迷失昏醉中的黑影。

由此，筆者建議，《二十一世紀》不僅僅應該在書齋、沙龍和學府中討論中國的歷史、現實以及未來，更應該面向實際生活。

湯本 洛杉磯(美國)
94.4.6

不能否認東西方的文化差異

從貴刊創刊起，我就是忠實讀者。一冊在握，如同聆聽同行前輩侃侃而談，得益良深。

但是，第21期木令耆的短文批評亨廷頓「狂言謬論」、「衰退的腦力活動」、「冷戰的神經質」等等，讀後使人不快。

作者大加嘲諷亨氏「文明衝突」論以後，認為「世界上甚麼是西方文化，甚麼是東方文化，此界線早已崩潰。」我認為東西方文化在諸方面——如基本價值系統上——依然涇渭分明。拿「人權問題」來說，西方的觀念、標準與東方——不論是中國還是亞洲其他國家——的觀念、標準並不相同。美國青年馬可·費在新加坡破壞財物，被新加坡當局判處監禁四個月、罰款四千元，再加鞭笞六下，西方輿論譁然，很多人為之驚駭，美國政府也出面干涉。但你若問新加坡人，我敢說大多數人認為馬可·費「活該」！這裏有沒有文化差異的問題？世界各種文化之間的界線並未「崩潰」，至於說「早(!)就崩潰」，真不知從何說起。

異質文化的差異是否會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衝突的主因，不宜斷言，但否認當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文化差異，既不符合事實，也不利於以清醒頭腦分析世界、面對未來。

李冬 北帕默斯頓(新西蘭)
94.4.12